



他出任清华校长的时候，仅仅29岁。

然而，他对清华建筑群的惨淡经营、他对清华精神的培育，使他成为——

清华的种子

○ 鲁伊

1911年的某个夏日。北京城外西直门到海淀的石板路上，两个西装革履的人，正骑着驴子迤迤而行。

这两个人的目的地，是城外20里一处废园。载漪因于园内聚义和团民设坛举事被发配新疆，园子被内务府收回。不过10年光景，便已围墙残破，户牖不存，只余园中桑树山茶，对着咸丰皇帝手书的“清华赐园”的匾额，寂寞地开谢。

又一个10年之后，这里居然成了混乱世道中的世外桃源。“什么都齐全：邮政局，电报局，银行，使皮鞋脚变成猫脚的软木地板，蹬不碎的玻璃地板，大理石的游泳池和厕所……那巍峨的屋子啊，有皇宫般庄严，而比皇宫舒服，有洋房的各式优点，而比洋房美丽。”1936年的《宇宙风》杂志上，有人带着点酸意地调侃。而此前的1920年，访问北京的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便已惊叹：“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所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让我感到完美。”

一般人都以为，清华大学是美国退还“庚款”建立的。其实，美国拿出的只是中国溢付的部分

1905年，驻美公使梁诚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交涉庚子赔款的赔付细节时，海·约翰透露美国的实际损失仅为1165.5万美元，余下的1278.5万多美元“原属过多”。梁诚当机立断，不再纠缠赔付的细枝末节，转而向海·约翰请求退还超收的庚款。身为1875年留美幼童的梁诚在致外务部的信中写道：“似宜声告美国政府，请将此项赔款归回，以为广设学堂，派遣游学之用。在美廷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

1908年11月，溥仪登基，一直想用这笔钱“整

饬路矿，以所获余利振兴学校”的北洋大臣袁世凯被解职。1909年，外务部上奏折“拟建游美肄业馆恩赏清华园”，清华园内始大兴土木。

前文两名骑驴人中，较为年长的叫颜惠庆，当时为襄理“游美肄业馆”。另一位年轻人是茶商的独生子，不到12岁就被送到颜惠庆执教的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书。他聪明勤奋，终日伏案阅读英国名著，英文造诣甚深，哪怕一封普通的信函，也都用字精当，文笔典雅。尚未毕业已被聘为书院的英文教员，协助颜惠庆编著了中国第一部英汉大辞典《标准英汉双解大辞典》。1907年，他自费留美，就读于耶鲁和威斯康星大学，1910年归国，参加了清廷留学生考试，与詹天佑、严复一样，成为带有浓厚时代特色的“洋翰林”。

1911年4月1日，468名考取学生聚至清华园中，举行开学仪式。颜惠庆正忙于外务事务，无暇抽身，第一时间进入颜惠庆视野的，便是这个得意门生——还有谁能比一个在美国大学获得过教育学硕士学位的人更适合参与管理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呢？

这个人姓周，名诒春，字寄梅。这个长久以来被有意无意遗忘了的人，奠定了令这所因国耻而生的学校深刻影响中国百年现代化进程的“清华之格”。

“寄师的原意，不是徒尔造就一班美国化的学生，而是要把清华办理成一所完全中国式的大学”

照片里的周诒春，有着饱满圆润的额头，深邃专注的眼睛，略为抵起的嘴唇。他实在太年轻——正式出任清华学堂教务长时，还不满29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烽烟四起，北京高校纷纷放假，清华美国教师全部出国避乱，不知学校重开何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与清华渊源颇深的

顾惠庆任外交部次长，周治春一度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清华大学得以于1912年5月重新开学。之后，二次革命中袁世凯挪用美国退回的庚款接济兵饷，清华一度无米下锅。

1913年8月22日，时任清华校长的唐国安心脏病发，遽然辞世。一息尚存之际，他荐周治春以自代：“（周）老成练达，学识皆优，自充任副校长以来，苦心孤诣，劳怨弗辞。国安虽病，该副校长兼理一切，颇能措置裕如。若以之升任校长，必能胜任愉快。”

此时此刻，周治春却正率领110名学生前往美国入学报到。每年暑假，周治春均亲自送学生赴美，帮他们安排好学习地点和程序后才离开。当年8月15日清华第五批“放洋学生”的陈鹤琴原打算到奥柏林大学攻读教育学，再转到哥伦比亚师范学院。但在船上，他又想要学医。周治春马上打了一个电报给留美监督，替陈鹤琴接洽转到美国最著名的医科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没过几天，陈鹤琴便开始后悔：“教育虽然不能使我独立，难道医学是我所愿意学的吗？我的志向是为个人的生活吗？决不！我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

周治春没有因他的反复而发怒，反而微笑着道：“电报已经打出，不能再改了。好在霍普金斯大学文理科也是非常著名的。”陈鹤琴1919年8月获得教育学硕士后归国，与陶行知一道开辟了一系列乡村幼稚教育基地，出版了大量儿童心理和幼儿教育专著，成为中国现代幼儿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但对于另一个学生所应该走的道路，周治春却显得有些一意孤行。吴宓初时打算学路矿等实学，转而又想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新闻出版。而吴宓的继父为其谋划的人生道路，却是“英文学好，易谋饭碗。洋行之买办，大人物之翻译，得钱皆不费，且最好先入美国籍，使中国亡，则可保一家之安乐”。吴宓为此纠结不已时，周治春却根据对他的了解，力主吴宓前往哈佛大学修习看起来十分没前途的文学。数十年之后，俨然已成学贯中西的文学大师的吴宓，才在日记中对自己早年多有腹诽的师长当初的识人洞见由衷地发出感叹：“校长实是宓之知己。”

在1917年《清华周刊临时增刊》上的一份训

辞，周治春提醒毕业生，在美留学期间，应注意四件事。一要发展个人潜能，勿墨守师说，世界是进化的。二宜自发心裁，创造发明，勿徒崇拜西人。他列举清华官费生祁暄发明“国文打字机”，王预之“对照表”和茅以升之“算尺”等例子，证明黄种人是有为的。三是注重调查与克己修省，“中国百政废弛，应调查改良者千万，宜取美人之长补我之短。不可为外国之诱惑力而自蔽自欺”。四则要服务社会，宣扬国光，时刻以孔子“己立立人，己达人”相勉。在与西人交谈时，也要阐扬本国文化，保持不亢不卑的言辞态度，更需在毕业论文中“择关于中国之学术政治社会实业等为题”，使不明中国情势的外人渐除隔膜，“顿起尊敬之心也”。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终极目标：“他日学成归国，报效祖国，贡献社



1926年，清华大学赴美留学生70多人在太平洋远航中的邮轮上合影



曾慨叹“校长实是宓之知己”的吴宓赴美时的护照



会，为母校增光。”

从1909到1925年，中国留美学生合计1031人，九成以上学成后回国效力。他们是清华、北大、南开等高等院校中的院长、教授，外交部、交通部、实业部等国民政府部门中的干员，银行、煤矿、工厂里的经理和襄理……这些当年自水木清华漂洋过海的种子，渐次飞回，重新扎根于古老中国的土地。

今天仍是校园中最优美风景的四大建筑，当年曾为他招来漫天诽谤

清华大学的物理格局，是周诒春惨淡经营出来的。“本校建设之始……园内旧建筑，岿然存者，只工字厅一所。开办时造成讲堂、宿舍、医院、礼堂等处，大小共计一千一百余间。”当时的图书馆，仅有“大房一间，小房两间，藏书甚少。”

但到罗素1920年访问清华时，这里“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的大学校”。给罗素留下这一印象的，无疑是周诒春于1916年主持修建的“清华四大建筑”：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和大礼堂。“大礼堂是模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建筑修正建造的，图书馆是模仿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图书馆略事缩小而造的。”1920年7月，图书馆主任戴

超按照周诒春在任时制定的“图书经费需占全校预算20%”的构想，一口气编列了11.5万元的图书采购预算，与之对照，当时全中国没有一所大学的图书经费超过2万元。民国元年时，清华图书馆的馆藏“中西文共仅二千余册”，到民国十年时，中文书即增至2万册以上，西文书增至1万册以上。再历10年，中文书已逾14万册，西文书已达4万多册。后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所以能汇集众多当代大师，这些藏书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然而，正是这些建筑为周诒春招来了漫天诽谤。1917年10月，北京教育界黄正明、刘文治等6人，向外交部指控周诒春的九大罪状，并将原文以《北京清华学校之黑幕》为题，刊登于北京的报纸上。与此同时，校董事会也给送学生赴美的周诒春发电报，质疑他此前拨付给驻美监督处的一笔购买钢材、图书仪器和聘请美国教员路费和薪酬的款项。

1917年12月，甫一归国，周诒春便致信清华董事会，详尽说明那笔受到质疑的款项每一角每一分的用途，结果是一切会计手续完整。1918年1月4日，他以“力微任重，劳顿成疾”为由，向外交部提出辞呈。1月18日，清华学生“着制服、擎枪致敬”，送别周诒春，许多人因之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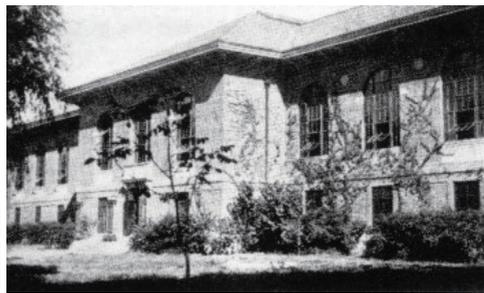
1921年4月，《清华周刊》10周年纪念号，校刊的编辑写道：

“学校一个时代的精神如何，就看校长的态度怎样。我们不必细究周寄梅先生的履历，确实我们承认他是有宗旨、有计划、有理想、有希望的人。清华以前享有的盛誉以及现今学校所有的规模、层层发现的美果，莫不是他那时种下的善因。”1931年4月，《国立清华大学20周年纪念刊》上，做出这样的评价：“周诒春任职四年余，建树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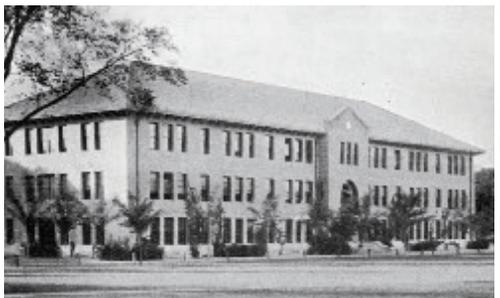
清华早期四大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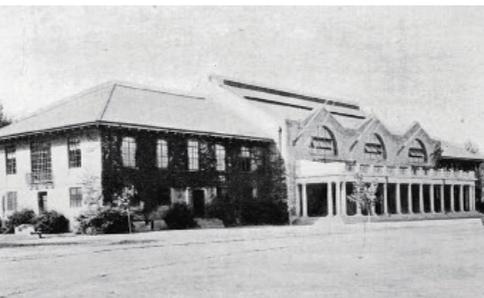
大礼堂



图书馆



科学馆



体育馆

众，历任校长无出其右。”

90多年后，他“妄靡巨款，营私害公”的罪证——清华的四大建筑，依然是这所校园里最优美的风景，而在此之后的许多营造，早已倾颓无存。

他总是在为某项计划辛勤劳动……支持他的是永不褪色的理想主义

从清华引退后，周治春担任的职务有天津永利公司董事长、北京仁立地毯公司董事长、北京协和医学院托事会主席、北京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北京中国营造学会理事长、北京图书馆建筑委员会委员、北京欧美同学会董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执行委员，一度还兼任燕京大学代理校长。

只要身在其位，周治春便尽力谋其政，从来不肯做挂名董事，也不肯因为身在某一机构便偏离自己为社会谋福利的立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何廉曾回忆道，1926年，当时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有意聘请何廉出任社会调查部研究主任，许以月薪400元，而何廉在南开的月薪只有180元，相差甚远。他向担任基金会董事的周治春请教是否应当接受这个邀请。周治春对他说，南开虽苦，但不仅能做研究，还可教课，劝他不要为钱而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当时的南开校长张伯苓商量一下。后来，何廉得到一笔特殊经费，用于创办南开经济研究所。

在1934年的英文版周刊《中国评论》上，主持人物特写专栏“知交剪影”的温源宁这样描写他所熟识的周治春：“如果他不是不断的忙碌，生命便没有价值。从早到晚，他总是在为某项计划辛勤劳动，以满足某种社会需要或是解决某种社会问题。他可以像个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那样对你说话，支持他实际活动的却是永不褪色的理想主义。”

清华同学会成立伊始，他便出面募集捐款，在北池子骑河楼购买布置了一个会所，内有游艺室、会客室、会议室及单人宿舍多间。而早些时候欧美同学会的成立和会所的修整，也出自他的大力倡议之下。他的目的，是将清华毕业生和欧美留学生联合成一支有组织的力量，以更好地造福社会。

1920年，美国政府第二次退还溢付的庚子赔款。在周治春的推动下，这笔赔款的一部分被用以建造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工程进



1927年12月25日，清华同学会新会所落成纪念，前排中左4曹云祥，中为周治春，右3梅贻琦。

展期间，周治春“每日早晚两次，风雨无阻地亲临工地视察指示，保证了它的建筑质量”。

一个如此热心为所在机构组织添置资产的人，却几乎从未花心思给自己买房置地。抗日战争结束后，时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的周治春前往北京办理敌伪机构接收事宜。由于他此前在北京的住宅早已折价偿债，只好借住于友人孙锡三客厅旁的一个小房间。但当农林部的另一名接收特派员徐廷瑚提议将一房屋和设备颇好的接收的日本人住宅拨给周治春使用时，他却断然拒绝。

他亦不图名。贵阳清华中学的基建经费大部分是周治春以为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字达铨）祝寿的名义筹集来的。教师们曾提议，既然学校的礼堂可以被命名为“达公楼”，至少也应有一建筑被命名为“寄公楼”。周治春却正颜答道：“只要我在世一天，就不许用我的名字命名任何建筑。”……

1934年，胡适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慷慨激昂地写道：“（最近）这二三十年中的领袖人才，正因为生活在一个新世界的新潮流里，他们的人格往往比旧时代的人物更伟大：思想更透辟，知识更丰富，气象更开阔，行为更豪放，人格更高。”这其中，便包括了周治春先生。

周治春，用他的一生，为我们描摹了一颗沉默无声的种子，在黑暗中经历了种种挫折与幻灭后，是如何以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自我牺牲精神，终于繁衍成一片壮美的森林。1958年8月30日，75岁的周治春在上海病逝。

（本文转载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16期）